

1975—1995

20

世纪

后期的

俄语学研究
及发展趋势

杜桂枝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后期的
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趋势
1975~1995

杜桂枝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后期的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趋势 1975~1995
/杜桂枝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8
ISBN 7-81064-173-5

I. 2… I. 杜… III. ①俄语-研究 ②俄语-语言史
N.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360 号

20 SHIJI HOUQI DE EYUXUE YANJIU JI FAZHAN QUSHI

20 世纪后期的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趋势
1975~1995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20 世纪后期(1975—1995)的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趋势》一书为杜桂枝的博士后专题研究论文,共 20 万字,分三大部分,全面系统地综述了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后 20 年俄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俄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第一部分内容介绍了这一时期俄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主要学术思潮及重要论著、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理论价值等;第二部分逐学科进行了理论论述,特别是理论上的重大变化和发展;第三部分介绍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思想在俄语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对俄语学研究的影响,着重评述了俄语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热”现象和俄语认知语言研究的状况。结论中对近 20 年来俄语学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当前语言学发展的四大理论基础,或称作语言学发展的四大特点。

1998 年 10 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该研究报告的评审会,参加评审的有语言学研究专家和俄语学研究专家:伍铁平、华邵、白春仁、汪嘉斐、郭聿楷、刘利民教授等。该书获得专家一致好评,认为论文的内容之多,时间跨度之大,是我国第一篇综述俄国近 20 年俄语学研究的论文,填补了我国俄语学宏观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论文的学术视野开阔,掌握信息全面详尽,占用资料丰富翔实,对俄语学发展的走向、趋势把握准确,对语言材料理解透彻,理论分析深刻精确,评价准确。研究中将点与面相结合,重点分析了若干新理论新概念,达到了深入的阐释,同时把现代俄语学的发

展,紧密地同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结合起来,揭示出俄语学发展的源与流,现象与本质,浅层与深层,是一个高水平、具有前沿性、宏观性、前瞻性的优秀成果。

20世纪后期的俄语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对这一阶段的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进行全面的评价性研究和理论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在我国的俄语学界,尚未有过这样全面系统介绍和评述俄语学研究的论文和书籍。因此,该研究论文无论对我国的俄语学研究,还是对俄语教学实践都极具价值:

1. 论文拥有大量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文献 and 知识信息,对我国俄语学界的知识更新十分有益;

2. 论文令人信服地评述了俄语学研究的主要流派的理论、研究现状、成果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发展上去把握俄语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避免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3. 论文涉及的语言学科广泛,内容丰富,为研究生教学提供了可选择的课题和可供参考的文献,有助于研究生了解和把握当前学术研究的关键;

4. 论文向中国语言学界(不仅仅是俄语学界)介绍俄罗斯语言学发展的最新情况,最新成就,为改变国内学术界轻视俄语语言学学术理论和研究成就的倾向,迈出重要的一步,作出有益的尝试。

该书可适用于从事俄语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研究生、学生,从事语言学、史学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俄罗斯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此外,该书对开阔俄语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及学生的眼界,拓宽知识都大有益处。

对于该书的问世,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刘利民

1999年9月24日

前 言

20 世纪后半期是俄语和俄语学研究，特别是现代俄语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时期。《80 年语法》的出版，标志着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新突破，使俄语学研究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跨入了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随着前苏联、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方面改革及民主进程的发展，俄语语言本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自由”，语言学研究也在不断地拓宽其视野和研究范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崭露出一批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和流派代表人物。

中国的俄语学界，特别是俄语学研究领域，一直关注着俄语学研究在其本土上的发展趋势和动向。长期以来，中国俄语学研究的前辈们一直勤奋地耕耘着，不断地把俄语研究中的新现象、新观点、新理论介绍给国内的同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俄语学研究者也经常发表介绍和研究俄语学理论的论文和著作，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俄语学研究的发展，推进了俄语教学实践工作。然而，目前尚未有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近 20 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后的十几年来俄语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全貌以及俄语学研究中的主要思潮及其流派、发展方向和趋势等的文章和专著。

本文的目的和任务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语言自身十分活跃,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其语言学思想和思潮也相应地活跃,新著新说也很多,因为语言的发展总是以深层次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思想作为指导基础的。因此,在描述 20 世纪后期现代俄语及俄语研究的概貌时,除关注近十几年来俄语自身发生的重大变化外,本文着重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一阐述:俄语语言学研究在现阶段的显著特点、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语言学理论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思潮;代表这些主要思潮的学术流派;它们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及研究成果;俄语语言学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无意全面回顾该阶段语言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不详尽描述现代俄语自身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各种因素等,作者仅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对 20 世纪后期(后 20 年),特别是改革以后的十几年间俄语研究的理论及主要发展方向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述,力求客观地反映有关学科的理论观点和原则性方针中最明显的变化,描述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被理论界公认为最有前景的某些理论思潮及学科流派,找出其中共有的某些“思维模式”,勾画出俄语语言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

几点说明

1. 考虑到语言学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历史进程:一个理论思想的产生到确定,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同时考虑到语言学理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与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 Ю. Д. Апресян 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现代俄语研究室主任 Л. П. Крысин 等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换看法之后,认为,相对于俄语学研究来说,“20 世纪后期”这一历史阶段应起源于 70 年代比较合适,因为 70 年代(专家们认为)是俄语学研究的一个活跃时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和论著,包括《80 年

语法》都应算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的重要成就。了解这一时期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状况，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状况和发展的脉络。

2. 由于近年来语言及语言学研究的内外“扩张”，语言内部各层次之间、语言学研究各学科之间都出现了明显的交叉和迁移，某些语言现象可以同时成为数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对象，即所谓语言学研究中的“多棱”现象。限于篇幅，本文尽量不重复描述同一语言现象在不同研究方向中的状况，对其论述的详略的原则是，以本人拙见，视其研究角度的新颖性和立论的严谨可信程度而决定。

3. 为了避免音译的不准确性和多样性，文章中出现的俄语语言学专家学者的姓名，一律用俄文书写。凡第一次出现，均注有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多次出现时，只用其姓，名和父名省略。西方的语言学者，除著名的语言学家，如洪堡特，索绪尔和语言学界熟知的现代语言学家，如乔姆斯基，哈里斯，格赖斯等外，原则上采用原名，以避免歧义。

目 录

第一章 近 20 年来俄语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1)
第一节 俄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3)
第二节 俄语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5)
第三节 俄语学研究的主要流派	(30)
第二章 现代俄语学中主要学科的研究状况	(39)
第一节 词汇学	(39)
第二节 构词学	(63)
第三节 词法学	(80)
第四节 句法学	(102)
第五节 语义学	(129)
第六节 语用学	(148)
第七节 计算机语言学 and 语料库语言学	(161)
第三章 西方语言学思想在俄语学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	(175)
第一节 乔姆斯基生成主义理论	(175)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	(191)
结束语	(213)
参考文献	(223)

第一章

近 20 年来俄语学 研究的基本状况

对前苏联-俄罗斯来说,1985 年至今的十几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革命”的时期。这一时期被俄罗斯语言学界称为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 (эпоха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йки)。在这一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苏联的解体,新体制的确立、变换……所有这些给俄罗斯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和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给俄语语言及其使用条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给俄语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前景。

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俄语学理论研究仍然沿着 20 世纪后半期,特别是 70 年代显示出的倾向和趋势继续发展。众所周知,在 70 年代,令整个语言学界震惊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激进特点。随着乔姆斯基生成理论^① 在世界语言学舞台上的“霸主”地位的消

^①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在我国语言学界通常称为“生成语法”、“生成理论”。在俄国语言学界则习惯称之为“порождающ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生成语法)、“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теория”(生成理论)。在近年来的俄语学研究中,较常使用“生成主义”(генеративизм)一词,最近又出现了“后生成主义”(постгенеративизм)的提法。这些术语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只是所指年代和范围上有些许差异。在俄语语言学文献中,这些术语时常交替使用。本文以评介和研究俄语学为主,为了准确地描述俄语学界在对该理论进行术语界定时在时间、范围方面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别,同时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和避免歧义,本文沿用俄国语言学界的术语概念。

弱，后结构主义的日益完善和强大以及新功能主义理论观点的出现，整个世界语言学体系出现了重新分化和组合。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俄语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浪潮。这一浪潮几乎席卷了俄语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以词汇语义学、词法学、构词学和句法学为甚。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语言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如：Н. С. Авилова 的《动词体及动词语义》(Вид глагол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глагольного слова. М. 1976)；Ю. Л. Апресян 的《词汇语义：语言的同义手段》(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М. 1974)；Н. Л. Арутюнова 的《句子及其意义》(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М. 1976)；А. В. Бондарко 的《俄语动词的体与时》(Вид и время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М. 1971)；Т. В. Булыгина 的《词法模式的理论问题》(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М. 1977)；В. Г. Гак 的《比较词汇学》(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М. 1977)；Г. А. Золотова 的《俄语功能句法概论》(Очерк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3)；Н. А. Мельчук 的《语言学模式“思想=话语”理论初探》(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 $\leftrightarrow$ текст>. М. 1974)；Е. В. Падучева 的《论句法语义》(О семантике синтаксиса. М. 1974)；В. П. Телня 的《二次称名及其种类》(Вторичная номинация и ее виды. М. 1977)；Л. П. Шмелев 的《词汇的语义分析问题》(Проблем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лексики. М. 1973)等。这些论著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俄语学研究的主要潮流，为本世纪后 20 年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方向和目标。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回顾近 20 年来俄语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的这一大批年轻学者 20 年来一直在自己开垦的领域里辛勤耕耘，如今已是硕果累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目前或者已成了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或成了某一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提出了重要的语言学理论，或发表了大量论文及专著，总之，成了 20 世纪末期俄语语言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领路人。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年轻的语言学者，和许多新的语言学思想或思潮。这些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语言学者，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西方的语言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的研究更具有挑战性和先进性，成为现代俄语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有这些从整体上构成了当今俄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结构。

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其传统性和继承性。从语言学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现代语言学理论是在重新评价传统的描写主义语言学概念和批判地接受以前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面对 20 世纪末期语言学研究内容和对象的多样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扩展，语言学中新认识、新设想、新推理、新理论的不断推出和更新，语言学史学家在承认当今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和由此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语言学流派的同时，却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一些学者悲观地评价目前形成的语言学研究状况，过分强调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分散性，认为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不景气时期；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语言的不断认识和其理论不断发展及变化恰好是语言学的一个永恒的特征，声明当今我们拥有的不是“铁板一块”的语言学，而是更带有局部特征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源于不同的资料范围，不同的哲学观点，具有不同的最终目的，甚至声明语言学不可能“幸免”于意见和观点的多元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许多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语言学的这种状况本身并不蕴藏着危险——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恰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共同丰富和发展了语言学研究。

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和描述 20 世纪后 20 年来俄语学研究的发展路线和基本现状，本章将从三个方面——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主要成就和主要流派——进行描述。

第一节 俄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纵观近 20 年来俄语学研究的全貌，就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而言，可以说，大致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研究素材范围扩大

随着俄语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其研究素材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过去不能或没有纳入俄语研究范围的内容,如今成了研究的对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语言

在前苏联时期,俄语是一种宣传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俄语成了宣传性语言、口号性语言和模式化语言。这种语言具有仪式性的严格规定的特点,构成了固定的封闭体系——政治语言。对于政治语言,虽然偶尔也有个别论文提及,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严格规定的封闭式语言体系似乎成了语言学研究的禁区。从语言内部讲,这种封闭的僵硬的语言模式实际上不具备语言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因此,也一直没有引起广泛的研究兴趣。

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为打破过去模式化的政治语言体系,创造新的俄语政治语言模式提供了条件,并激发了广大研究人员对俄罗斯本土上和境外许多语言现象的研究热情。观察、收集、分析和研究政治语言、研究政治语言的词源构成、变化、分类及使用特点等已成为众多研究人员的热门课题。学术权威部门也对新时期出现的这一新现象极为关注。1991年,俄罗斯(前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曾就政治语言问题召开过圆桌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政治语言研究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有力的推动。1993年俄语研究所集体编辑出版了《俄罗斯政治语言与社会思想》(Рус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和《莫斯科人的话语》(Речь москвичей)等书。这些书收录了持俄语为母语的人在各种集会上、在旅途中、在工作岗位上、在家庭的宽松环境中、及在街头巷尾等不同场所,就政治话题自由发表讲话的录音,并作了注解。此外,该研究所还根据计算机储存的1989~1992年间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的大量资料,整理出版了第二版《俄语政治比喻(暗喻)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етафор)。与此同时,政治话题和政治家们的语言也成了这一时期各种语言学刊物中众多评论性文章的研究对象。

2. 经济词汇

众所周知，俄罗斯所经历的这场重大的变革，首先触及的除了政治，就是经济。旧的经济体制被打碎，老的经济教条被废除，新的经济模式在逐渐形成，新的经济文化也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经济关系中新的主体的出现，经济行为中的市场模式——所有这些无不在语言中首先得到充分的反映。对俄国人来讲，“市场”这个词成了全新并具有魔力的字眼，并首次用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①，标志着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新的经济词汇的出现。这些经济词汇、术语勇敢地跨越了传统的极狭窄的专业化用途的界限，堂而皇之地通过书面形式进入了各种关于经营与管理、租赁与咨询、财会与审计等重要的出版刊物中，并广泛用于广播电视的语言中，出现在人们日常口语中。例如，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成了仅次于天气预报的重要信息，电台、电视台每日几次通报汇率变化，并对此加以分析评论。再如，随着贸易的发展，各类公司的大量出现，人们对做买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商品流通领域的术语也被广大民众所熟悉并使用。经济概念中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和术语成了某些社会层次的主要谈论话题，甚至成了语言笑话、文字游戏和拼字游戏的材料。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经济词汇已日益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们的口语语言。

除此之外，许多在过去的制度下被禁止使用的、或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例如，目前广泛使用的 *прибыль*,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бизнес* 等词，在科学院 1984 版的《俄语词典》(*МАС-Мал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х т. М. 1984*) 中是这样解释的：

прибыль —— “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一种收入，这种收入的来

^① 系指 1990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 (*съезд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会议确定了如下方针：1) 俄罗斯的独立；2) 改革开放；3) 实行市场经济。会议纪要中首次使用了 *рынок* 一词。

源是资本家个人所有的剩余价值……”；

бизнес——“（口语）一种商业行为，灵活的投机勾当，非法经营等，作为个人发财、谋利的来源”；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1）资本家：工业和贸易等企业的管理者；

2）生意人（不赞）：有利可图的业务的灵活的组织者”。

显然，这样的词义注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烙印。如今，这类词摆脱了强加于它们的“政治意义”，由贬义变成中性意义，甚至变成了褒义的词汇，如，在第四版的《俄语详解词典》（Ожегов С. И. и Шведова Н. Ю. М., 1997 г.）中，对这几个词是这样解释的：

прибыль——1）收入或回收资金中超出用于经济活动或产品生产费用的部分；

2）经营活动中经济效益的总括性指标；

3）（转义）好处、利益。

бизнес——企业或个人所从事的旨在能带来收入和利润的经济活动。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1）企业、公司的管理者，或从事经济、金融领域活动者的总称；

2）精明而务实的人。

目前，这类词连同各种“新”的意义已广泛用于各种媒体。

面对十分活跃的经济词汇—术语体系，面对这类词汇语义及功能上发生的变化，俄语学研究为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对这些词汇既要作出涉及经济变化的实质这种非语言特点的解释，同时必须给予纯语言学方面的描述。因此，在大量出版这一领域的各种术语、词汇词典的同时，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类词汇的来源、语义变化、语义分析和使用上，如：Т. Г. Винокур 的《讲话人与授话人——言语行为的各种变体》（Говорящий и слушающий. Варианты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М., 1993）；Т. И. Заславская, Р. В. Рывкина 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Соци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М., 1990）；М. В.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ая, И. И. Розанова 的《现代城市交际的主要趋势》（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 1994); А. П. Окунева 的《交易所、经纪人、红利》(Биржа, брокер, дивиденд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ССР, М., 1991 № 9); С. В. Падучева 的《经纪人、代理人及其他中介人》(Брокеры, дилеры и другие посредники //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1994 № 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Е. А. Земская 主编的《20 世纪末期 (1985~1995) 的俄语》一书中, Кытайгородская 专门撰文对现代经济术语进行了分析, 从经济术语的成分、来源、社会因素的影响及称名的主要方法以及经济词汇的组织结构体系的主要特点和使用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

3. 脏话

另一个长期被俄罗斯语言学界视同“禁区”的语言学领域, 更准确地说是语言的一个“禁区”, 就是行话、黑话、骂人话。近一个时期, 随着语言使用的“自由化”, 粗话、行话、脏话、下流话也随处可见, 甚至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也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词语。当然, 语言研究者都清楚地了解, 下流话、骂人话是一个古老的现象, 在斯拉夫传统文化的某一时期, 这类话语甚至是起着某些仪式或某种文化的功能。然而, 多少世纪的传统文化的演变, 已不再接受这种淫秽的词语。如今, 一般的普通读者和听众又不得不碰到这一语言现象。А. Л. Дуличенко 在《20 世纪末的俄语》一书中曾指出: “看来, 下流话的侵蚀已不可能阻挡。这些话语能否成为普通的, 也就是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头脑中变成中性词, 变成表达情感的一种手段, 就像某些刊物所希望的那样? 这种现象是否会破坏俄罗斯语言文化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回避下流事物和行为的实质, 却回避这些下流事物的说法、称名及叫法”的传统? 对这些问题只有时间能作出回答” [1994]。

面对这种语言文化现象, 确切地说是一种反文化的语言现象, 科学界所持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 一些人认为, 应冷静地把这一现象作为一种语言事实, 作为话语实践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加以分析和研究, 另一方面, 有人认为, 在激烈地反对和谴责粗话、下流话的同时, 必须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 指出这种语言现象的弊端, 表明它与俄罗斯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是违背社会语言规范的现象。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如今这一领域都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一大批年轻的俄语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目前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词典类的书籍（见“成果”一节中的词典学部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既有专业的语言学者，也有业余爱好者，因此，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也不尽相同。

与此同时，分析研究这一语言现象的论文著作开始出现，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如 Земская 等都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些问题：Земская 的《论现代俄语行话词典：编写原则及词条范例》（О словар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жаргона. Принципы составления и образцы словарных статей. 1994）、《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都市语言中的俗语与行话》（Просторечие и жаргон в языке русского города 90-х гг. XX столетия. 1995）、《现代俄语行话的词典材料》（Материалы к словарю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жаргона. 1996）；О. П. Ермокова 的《当代青年行话及其在其他非标准语言系统中的地位》（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олодежный жаргон и его место среди других некод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истем языка. 1994）、《俄罗斯青年行话中的语义变化过程》（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русском молодежном жаргоне и арго. 1995）；Т. В. Зайковская 的《当代青年行话词汇的扩充途径》（Пути пополнен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лодежного жаргона. 1993）等。

4. 移民语言

俄语学研究中的另一个较少涉足的语言领域是移民（文学）语言。这里所指的移民文学语言，不仅仅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作家的文学作品，而且包括那些在苏联时期写出的，而当时未能在国内发表，后来在国外或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发表的作品，甚至包括国外侨民活的口语语言。这一领域真正的开放，应该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事。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但却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极大兴趣。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国外侨民的大量文学作品，而且还发表了许多评述和研究移民作家语言风格的论著及文章，如对 В. Набоков, Л. Солженицын, Б. Зайцев 等作家的作品及语言特点的介绍和评论。语言学界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移民作家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且注